

重視「非稅收入增長」



財政部 6 月 17 日發布《我國個人所得稅基本情況》報告，首度正面回應「個稅起徵點是否應該上調」爭議：大幅提高起徵點後，高收入群體受惠多，低收入群體的利益反而會受損。報告同時透露，根據經濟發展情況、居民消費支出、市場物價水平等變化情況，今後個稅起徵點還將適時作出調整。

對於財政部的說法，我們先暫且不討論其理由，因為在金融危機的衝擊下，我國的財政收入連續出現了大幅下降。但是這些問題並不是推遲我們財稅改革的任何藉口。

### 政府部門習慣大手大腳

觀察近些年，凡是個稅話題，無不是集中在免徵額的爭論上。而免徵額只是個稅問題中的一個，如何讓個稅兼顧不同家庭、不同地區、不同收入來源等，才是最終解決個稅公平問題的關鍵。

我們從財政部最新公布的 5 月份的財政收入數據來看，5 月份全國財政收入 6569.47 億元，在今年前 4 個月全國財政收入逐月均為負增長的背景下，5 月份全國財政收入「由負轉正」，同比增長了 4.8%。在實施了各種稅費減免之後，許多稅種都出現了大幅的下降局面，但是由於採取了各種措施，使得這種局面得到改觀。然而地方財政收入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是非稅收入增長。統計顯示，5 月份全國非稅收入同比增長了 1.3 倍，這表明地方政府加大了徵收力度，在合理的前提下對稅和費的應收盡收。

這個非稅收入的增長到底屬於什麼框架內的徵收，我們一般無法去求證。從政府部門本身來看，由於我國這幾年的地方政府機構的擴張，攤子擺得越來越大，行政費用的成本越來越高。在我國經濟保持較高增長的時候，財政收入有一個穩定的保障，所以政府部門不會擔心資金的來源問題。但是次貸危機後，緊接而來的金融危機使得我國的經濟面臨着巨大的衝擊，各種矛盾開始顯示出來。但是政府部門由於習慣了大手大腳，對財政開支沒有一個切實的限制措施，相反有的地方還出現反弹。這些都給我國的財稅體制改革帶來了不小的障礙。

### 壟斷企業巨額利潤流失

再從數量巨大的央企及地方國有企業來看，尤其是央企，由於具有壟斷的優勢，所以他們在壟斷的優勢下獲得了巨額的利潤，但是他們只需每年象徵性的向國家繳納少得可憐的稅收，巨額的利潤被企業內部瓜分，使得原本屬於國家的收益就這樣流失，造成國家財政需要有效的資金補充的時候，沒有可用的資金來源。

我們從報告裡看到：2008 年年所得 12 萬元以上納稅人自行申報的人數為 240 萬人，約佔全國個人所得稅納稅人數 3%；繳納的稅額為 1294 億元，佔全國個人所得稅總收入的 35%；自行申報人員多集中在電力、金融、石油、電信等部門和公司股東、企事業高管等職業。這些部門毫無疑問就是目前的國有壟斷部門，所以才會有財政部目前這個各打一板子的報告出來——對於高收入群體，今後個稅起徵點將適時作出調整；對於低收入群體，提高起徵點後反而會受損，言外之意就是不提高為好——我們可以看到的就是一個毫無意義的解釋。

## 官員的「學歷」 □王攀

深圳原市長許宗衡突然落馬，江蘇市委書記王榮到深圳履新，這幾天為媒體關注。最新一期（6 月 23 日）瞭望東方周刊有關王榮的新聞，提到王榮的博士學歷，用了小標題「學歷貨真價實」做了詳細介紹；而在網站轉載中，網站編輯把小標題換成了大標題：「深圳代市長王榮曾一年一陞遷，學歷貨真價實」。官員「學歷貨真價實」成新聞點，讓人好生驚訝。

官員「學歷貨真價實」成新聞，是因為罕見。也就是說，官員高學歷貨真價實的太少，以至於王榮的博士學歷貨真價實，成了新聞。官員高學歷，假的常見，真的罕見。這是一個悖論。

嚴格來說，官員的假學歷，與其他的假學歷不同。官員假學歷，是假的真學歷。即，證是真的，但拿證的過程是假的。而其他人的假學歷，是真的假學歷。即，學歷造假，證是假的。假的真學歷和真的假學歷，雖然同樣是假，但前者合法，後者非法。如果出現一兩個官員真的假學歷或假的真學歷，只能說明個別官員出了問題；但如果官員高學歷造假成為一種現象，以至於官員「學歷貨真價實」罕見，那就不止是個別官員的問題，而是官員所處環境出了問題，是環境為官員假學歷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其實，官員假的真學歷現象，已經不是什麼新聞，輿論對此的剖析、鞭撻，甚至給出的解藥舉不勝舉，早已到了說者懶得說，聽者懶得聽的地步。公眾原來的激賞早已被消磨殆盡，官員當初的羞愧早已反以為榮。現在，公眾誰還會對官員「高學歷」不知道咋回事？官員誰還會把學歷注水當成羞恥？官員「學歷貨真價實」成新聞，聽起來荒唐，荒唐得叫人失望。

## 台灣電視過度商業化

**動向**

2009 年 6 月 16 日，台灣領導人馬英九接受台灣《天下雜誌》專訪時表示：「不統，不是排除統一選項。19 日，香港鳳凰衛視的時事辯論會馬上就將議題列入討論。可以看出，由於台灣媒體過度商業化，使得馬英九的講話經常會被斷章取義，原始意思經常得不到反映。對於這一點，現任國台辦主任王毅已經意識到，並且王毅主張讓大陸政府的計劃直接面對美國和台灣民眾。台灣媒體過度商業化後，多元化的媒體都變成惟利益是瞻，民主也成爲工具。

在全球化的今天，媒體的責任與盈利是相輔相成的，但兩者關係的比例並不是一半一半。就是說，媒體在發展過程中存在一定的偏重問題，2000 年後，台灣電視媒體發展的偏重點，是在商業化與盈利。

### 媒體重利輕公平

其中的主要表現有如下特點：

- 首先是收視群的問題。台灣大約存在九個新聞頻道，分別爲：年代、東森、中天、民視、三立、TVBS 等。TVBS 新聞、東森財經和非凡財經台，這麼多的新聞頻道存在的一個最大問題就在於：其新聞的受衆年齡大約都在 15~30 歲之間。媒體調查公司評斷標準的關鍵就在於受衆潛在的消費能力，並且這些數據成爲廣告商判斷廣告投入量的標準。試問，如果所屬權是黨政的媒體，需要太商業化的模式嗎？比如，大陸的中央電視台七點半後的新聞聯播，就是完全黃金時間段，這個時候的廣告由央視本身進行招標，央視本身獲得最大的利益。當然現在央視的壟斷行爲也爲人所詬病，其中的問題不在於央視本身的壟斷行爲，而是央視如何適當的商業化，把資源分配下去。

### 主播群譁衆取寵

媒體商業化後，如果主播群能夠有一些八卦媒體來關注，那麼對於電視的收視率有好處。

香港鳳凰衛視原來也對主持和娛樂的分界並不十分清楚，但由於鳳凰衛視的收視群很多都是對於中國歷史非常感興趣的老人家，這變相使得鳳凰衛視本身就不會鼓勵主播過度參與娛樂活動。儘管鳳凰衛視承認自己收視率最高的往往是軍事節目，但紀錄片始終是一棵常青樹。在黃金時間播送記錄中國歷史的紀錄片成爲鳳凰衛視的特色。

現在台灣新聞台往往沒有任何有創意的紀錄片，對此，中天電視台的主持人陳文茜經常表示很遺憾。自己無法引用台灣自產的紀錄片。

儘管台灣的新聞環境非常的自由，但台灣對於自身的圖像記錄和口述歷史非常有問題。2000 年前，主要是李登輝對於歷史的認識和國民黨內部的人士有差別。2000 年後，台灣出現的藍綠鬥爭，嚴重影響台灣電視台對於自身歷史的記錄進程，並且在地化被簡單塑造成本土化和「台獨」。

儘管台灣有三百多名來自美國留學的傳播學者掌控新聞傳播的進程，但台灣對於英國、德國、法國、俄羅斯的傳播發展進程的重視相當淺薄。台灣政治大學的馮建三教授一直支持台灣公共電視的發展，希望台灣公共空間的發展能夠減少商業電視的淺薄，但收效甚微。

台灣要減少商業電視台的影響可能性很小，不

如將公共電視台的頻道擴大，並增強其主旨，逐步佔領台灣 40~70 歲受衆的空間。就是說公共電視台也應該建立自己的新聞台，並且應該聘請來自英國、法國、德國和俄羅斯的專家來台灣具體指導。政治大學的傳播學院應該組建專門研究公共電視的專門單位。如果培養的人才都只進入商業頻道，那將是電視傳播的不幸。

### 金溥聰與虎謀皮

馬英九身邊的第一智囊金溥聰就希望和商業媒體結合做電視傳媒，最近傳出有破局的可能。其實這種設想基本屬於與虎謀皮。如果金溥聰能夠在公共電視上多做努力，將公共電視發展成爲跨黨派的傳媒，在媒體人的公共化上做文章，讓黨派少干預公視的運作，這樣就不會浪費太多的时间在一些無意義的事件上。在公共化問題上，金溥聰可以參照俄羅斯公視的經驗，就是讓媒體人成立自己運作的公司，保障媒體人的未來福利，黨派和行政只佔有股份和出資。

其次是台灣電視新聞過於社會化，缺乏社會責任感。台灣社會同樣需要和諧，民主並不是意味着亂像，要反映台灣在經濟建設中的成就和問題。台灣除了台北市外，很多縣市初期規劃時，連人走的路都沒有，行人、摩托車、騎車混行的路比比皆是，直到現在都沒有改變。

台灣在與大陸十幾年的對抗中喪失了修正自身問題的機會，把媒體的商業化等同於民主化。這使得現在馬英九都找不到一家可以長期反映自己規劃的電視台。這對於電視受衆公平嗎？受衆需要聽那些主播、名嘴胡亂解釋政策嗎？

電視新聞台過度商業化，加劇了政治的藍綠對抗和新聞商業化監督，因爲只有對抗和假監督才有商業利益和廣告。對抗削弱了台灣綜合實力，假監督沒有解決任何的問題，包括一名主持人好像又有企圖心重返台北市長的選舉。商業化媒體就是台灣內部的特洛伊木馬。

作者為大學副教授，博士

# 美聯儲儲權力膨脹之憂

□蔡亮



美聯儲背負的本輪全球金融危機「始作俑者」的罵名並非空穴來風。如今，在美聯儲儲權力有望急劇膨脹之際，相關歷史包袱是否會削弱其作為「超級監管者」的威信，進而影響到其監管職能的最終執行，疑問顯然揮之不去。

信息，將促使這些激進的投行不惜以壓縮資產規模、分拆業務門類爲代價，跳出監管體系。長此以往，美國金融業整體效率的恢復，難有明確的時間表。

### 美聯儲毀譽參半

八十年代前期，美國經濟開始進入需求過旺的通貨膨脹周期，從金融消費品的迅速普及再到垃圾債券的不斷增發，美國資本市場儼然一派沸騰氣氛，非理性繁榮埋下的隱患日積月累。彼時，美聯儲掌舵人羅伯·沃爾克以盯住通脹爲美聯儲決策原則，不惜以經濟衰退爲代價全力擠壓資產泡沫，最終爲九十年代美國新經濟的騰飛打下了堅實基礎。

然而，從 2002 年年中開始，美聯儲決策再次邁上了一條不歸路。當時，機構普遍預測美國經濟已步入繁榮周期。與之相比，时任美聯儲主席的格林斯潘卻看法迥異。在他看來，美聯儲理應吸取上世紀 80 年代末日本在國內股市崩盤後所經歷的長達十多年的經濟通縮教訓。他據此認爲，美國經濟在納斯達克股市崩盤後同樣將面臨長時間的通縮困擾，美聯儲應繼續執行寬鬆的貨幣政策。

因而，在當時的美國經濟已步入繁榮周期的客觀條件下，美聯儲卻「將寬鬆進行到底」。其結果便是，直到 2004 年年中美聯儲忙於祭出利率大棒之時，此前延續了兩年時間的美聯儲貨幣政策的「不作爲」已使得美國資本市場乃至全世界都充斥了過度氾濫的弱勢美元泡沫，進而爲本輪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提供了異常充沛的貨幣「彈藥」。

由此可見，美聯儲背負的本輪全球金融危機「始作俑者」的罵名並非空穴來風。如今，在美聯儲儲權力有望急劇膨脹之際，相關歷史包袱是否會削弱其作为「超級監管者」的威信，進而影響到其監管職能的最終執行，疑問顯然揮之不去。

出於防止美聯儲權力過於膨脹的考量，也出於對美聯儲監管能力「維穩」的目的，在奧巴馬政府

提交的金融監管改革方案中，還計劃成立一個由美國財政部牽頭組成的金融服務監管委員會（FSOC），美國現任財長蓋特納將兼任該委員會的主席。監管委員會將負責協調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CFTC）、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聯邦住房金融管理局（FHFA）等機構的監管行爲，並向美聯儲提供決策意見，及時指明哪些金融機構需被納入「系統性風險」監管體系。

### 決策恐偏離經濟

奧巴馬政府將「超級監管者」的身份賦予了美聯儲，又施以監管委員會的「緊箍咒」，意味着權力急劇膨脹的美聯儲今後將被政府的救援行動所牢牢「綁架」，這與以往美聯儲只盯住通脹、始終保持貨幣政策超然地位的處境大相逕庭。難怪在提交金融改革方案後，總統奧巴馬面對媒體邀談美聯儲現任主席伯南克的留任問題，進而引發媒體猜測前總統克林頓有望在伯南克任期結束後接替美聯儲主席一職。看來，奧巴馬政府或多或少地已經認識到，新的美聯儲主席恐怕需要極高超的政治手腕才可「摘掉」國會參衆兩院。

隨着市場對美國銀行業危機「見底」的預期日漸，金融監管改革方案成行的緊迫性也將悄然而變。至於美聯儲即將過度膨脹的權力是否會隨着危機的逐漸「見底」、隨着監管改革緊迫性的降低而受到明顯的削弱，我們仍需拭目以待。

中國醫保制度的改革，既要有廣度，也要有深度。在廣度上，就是徹底廢除只服務於少數人的公費醫療制度，實現公平合理的全民醫保；在深度上，就是把醫保「產品」做深做精，全面提高參保人的醫保待遇，讓百姓從此再也不會爲看不起病發愁，也讓他們更願意參保，再也離不開醫保。

### 大幅提高醫保水平

全民醫保在中國是大勢所趨，它是政府返利於民、讓全民共享改革開放成果的具體體現。全民醫保的積極意義和潛在價值豐富，包括：（一）參保率越高，源自國家、社會和個人的醫保基金籌集量越大，醫保制度就越強壯和健康並具可持續性；（二）讓國家衛生撥款爲全民共享，更利於提高資金使用效率，把錢用到刀刃上；（三）可全面提高國民健康水平、社會滿意度和社會穩定性，降低社會成本；（四）利於普遍提高國民醫療購買力，從而拉動內需，刺激醫療消費；（五）利於城市或地區吸引和留住人才、提升競爭力。

只覆蓋機關事業單位職工和退休人員等極少數人的公費醫療制度，是助長醫患「小病大治」、導致醫療資源過度浪費並由政府爲之買單的一種低覆蓋、高成本、低效率、提供「醫療特權」（享有者無需繳費，但醫療費報銷比例高）的問題制度。而醫保制度由三方共同出資，如果參保率高，基金管理得當，參保人的醫保待遇將不減反增，且制度有可持續性。北京平谷區便在本市率先取消公費醫療，機關事業單位職工和退休人員全部被納入基本醫保制度，每人每月繳費幾十元到上百元不等。其目標就是全民醫保。

實現了全民醫保，但醫保水平不高，參保人仍覺得看病貴，尤其看不起大病，則表明改革遠未結束。全民醫保及醫保水平提高，應是兩個互爲依存、並行的目標。醫保待遇提高了，醫保吸引力提高了，百姓參保積極性才能提高，也能提早實現全民醫保，自此形成良性循環。深圳醫改的目標便是，既要實現全民醫保，又要把醫保待遇做到全國最高。

全民醫保，實質是全民享受基本醫保。它很難解決參保人看病貴的問題。政府對此鼓勵參保人（包括個人和僱主）購買補充保險。筆者認爲，政府也應通過多種渠道籌集大病醫保基金，例如完全可將公益彩票收入轉作醫保基金之用；政府還可發行醫療或醫保彩票以籌集資金。

令國人倍感震驚和激動的「神木醫保模式」，讓神木人在全國率先實現了醫保改革最高目標，即醫保高覆蓋率（全民醫保）和高受惠度（醫保報銷比例全國最高）。但人們也擔心，由於政府過於「慷慨」，有朝一日政府「彈盡糧絕」，這個讓羣衆的醫保制度會失去可持續性。不過，筆者認爲，這種擔心是多餘的。其實，實現全民醫保並不難，難的是像神木那樣大幅提高醫保水平，讓參保人看得起各種病。

### 增強基金管理能力

筆者認爲，影響醫保制度可持續性，財政撥款固然重要，但非最關鍵因素。我們應高度重視和處理好另外幾大影響因素：

一是百姓參保率。參保率越高，從政府、社會和個人那裡所籌集的醫保資金量越多，醫保水平或參保人受惠度才能越高。

二是醫保吸引力。它直接影響參保率。醫保受惠度高，繳費率低，醫保才有吸引力，也就不會再發生類似事件了。江蘇鎮江計劃讓醫保個人帳戶爲家庭共享。新加坡允許參保人靈活支配其醫保個人帳戶，鼓勵醫療儲蓄，但有最高和最低限額。二者均是提高醫保吸引力的好方法。

三是醫保基金管理能力。醫保機構必須科學管理醫保資金，不挪用、佔用和浪費，更不能用其覆蓋高昂的管理費（據悉某市住房公積金中心被疑用基金去應付近 2000 萬年的管理費）。希望醫保機構管理不力。它應努力提高資金使用率，最大限度地把資金花在參保人身上，把錢花在刀刃上。

總之，中國醫保制度的改革，是決定新醫改成敗的最關鍵因素。醫保制度改革的兩大並行的終極目標，是醫保高覆蓋率和高受惠度，以確保醫保制度健康和可持續發展。只實現全民醫保，但醫保待遇不高，不足以解決百姓看病貴的問題，則表明改革尚未成功，仍需繼續努力。爲實現這兩個目標，各級決策者和管理者必須具有實現改革創新、管理創新和服務創新的勇氣和智慧，向陝西神木縣、北京平谷區和深圳市的醫改取經和學習，學習他們爲實現這兩個目標而不畏艱險、不懈努力。

作者為企業策劃人